

# “天河之水”入“黔山”，长效扶贫“不一般”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让产业扶贫“引得进、留得住、可持续”

“在深度贫困地区，产业扶贫不能“一引了之”，农产品也不能“一卖了之”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不仅引来企业，还引来留得下的产业链；不仅卖出了农产品，还帮贫困户培育市场意识；不仅为脱贫按下“快捷键”，更为巩固脱贫种下“长效果”

本报记者张典标

“你们是流转土地自己种，还是农民种了你们收？”

8月底的一天，贵州毕节市大方县副县长张勇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广州一家桐木加工企业想帮扶大方县建种植基地。张勇很欢迎，但抛出了一箩筐问题。

他不仅替贫困户算账，也替企业算账。“这不是泼冷水，没有切实可行的盈利模式，企业待不住，产业留不长，最后受伤的还是贫困户。”

最终，张勇建议企业先在大方县小规模试点，等双方都有“获得”了，再大规模。

要是搁3年前，他巴不得企业先过来再说。

2017年，张勇还是广州天河区金融商务局副局长。当年3月，他报名参加扶贫协作干部选派，赴大方挂职副县长。大方县所在的乌蒙山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广、贫困程度最深的地方之一。刚到大方，张勇急切地希望引来产业项目，帮扶

立竿见影。

也许是广东干部的“务实天性”，张勇和来自天河的挂职扶贫干部通过调研熟悉情况后，深切认识到，扶贫关键在可持续，扶贫项目企业有赚头才能留得住。产业扶贫仅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实打实算账，决不能忽悠。

本着这种求真务实的绣花功夫，自2016年对口帮扶以来，天河区帮助大方县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0个，都没有出现“水土不服”，带动近万贫困人口彻底脱贫。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天河的帮扶不仅为脱贫按下了“快捷键”，还为大方发展注入了催化劑。

和这家桐木加工企业算完账后，又迎来新一批天河区的帮扶教师。张勇提醒他们，“帮扶不是高高在上，要多向当地干部群众学习。”

引进来：招商更要留商

取暖炉产业何以在大方扎根成链

2017年年初，大方县扶贫招商，招来

了原本在广东中山的富筑公司。

富筑是取暖炉生产商，产品主要销往贵州、四川、云南等地。随着中山的用工成本和厂房租金越来越高，地处滇、黔、川交界的大方县，成本低了不少，又临近市场，对富筑是有吸引力的。但同样具备这两样优势的地方，不只是大方县，不少地方开了更有诱惑力的条件。

公司负责人余铨铮后来才透露，真正让他下决心从中山搬到大方，恰恰是当地干部的坦诚。余铨铮见过一些地方在招商时吹得天花乱坠，等企业入驻之后却不兑现。而大方招商，张勇等县领导“三顾茅庐”时，就把他们能提供什么、不能提供什么讲得明明白白，对存在的问题怎么解决也说得清清楚楚。

让余铨铮印象深刻的是，政府各个部门现场办公，整套手续两天就办妥。承诺要解决的水电问题，没多久也都解决了。

余铨铮单枪匹马入驻之后，张勇马上找他拿到在中山的配套企业名单，要给他“说媒找伴儿”。“引进一家企业，没

有上下游企业做配套，很难留得住、活得好。”当时，余铨铮的大部分配件还得从中山进。

王白洋是余铨铮十几年的好朋友，也是余铨铮的供应商，生产取暖炉上的玻璃板。

可张勇给余铨铮说“伴儿”时，王白洋很不情愿，请了三次也没请动。

其实，王白洋也感觉到企业在中山面临的压力。当时，没有5000块的月薪，连普工都招不到；5000多平方米的厂房，一年租金就得80多万元。这两块占了生产成本的一半以上。

可是，他对大方压根不熟。自己努力大半辈子才在广东扎下根，怎能随便冒这个险？

这样的疑虑，余铨铮当初也有，“设备坏了能修吗，周边有配套吗？”余铨铮2016年底第一次到大方县考察时，心里有点凉。当时，大方经济开发区连供水供电都不稳定。

当地干部坦率地告诉他，大方是贫困县，能提供的只有五年的免租金

厂房，再没其他补贴。另外，用工时还必须优先考虑贫困户。至于水电问题，会立刻着手解决。

王白洋陆续把设备挪到大方后，因为担心做不好，他没向开发区要厂房，索性借用余铨铮的部分厂房。没想到，几个月后，借的厂房已经不够用了。

王白洋算了一笔账，除了省一大笔厂房租金和用工成本之外，销售量也比在中山时翻了一番。原本贵州取暖炉厂家采购玻璃板必须凑满整辆13米的半挂车才能发货，还得找库房存放，需要大量资金；而现在，随要随买，找个小车就能拉走。半年下来，能替买家省下100多万元的运费。

今年3月，一家销售取暖炉的电商主动找园区要入驻。最初，招商只能靠天河区和大方县的帮扶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动员，如今，电商、塑料、电路等相关企业开始自己找上门。大方经济开发区形成了包括玻璃、发热管、五金、燃气、包装在内齐全的取暖炉产业链。

(下转6版)

## 精准扶贫，这样的“多此一举”多多益善

本报记者张典标

车到地里把土豆拉走就得了，为何要分拣？蔬菜在本地卖完就行了，为何要费劲送到广州？

广州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脱贫攻坚，扶贫干部一度让贫困群众不解的“多此一举”，“多”的恰恰是“精准”而不是敷衍。

因为，在深度贫困地区发展扶贫产业，不能满足于“一引了之”“一卖了之”。如果扶贫视野不够长远，不谋划“卖完之后”“引进来之后”的长期发展，很容易陷入“帮扶干部一走，扶贫产业就散”的怪圈。

“逼”菜农把菜卖到广州去，不仅提高了蔬菜销售价格，更是多了一个销售渠道，渠道多了，将有助于避免单一市场潜

伏的风险；多一道分拣程序，是帮贫困户养成标准化生产意识，让小农户更好对接大市场；贫困户打工挣了几个钱就想走，帮扶干部苦苦挽留，是希望他们在继续打工中获得一技之长，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业工人；引进一家企业，还费心“做媒”帮助扩大朋友圈，是为了让企业不靠优惠过日子，真正扎下根……

来自广州“经济第一区”天河的帮扶干部具有敏锐的市场意识，更有务实的作风。对口帮扶的“多此一举”，是对贫困地区群众的“市场意识扶贫”，是着眼长效脱贫的治本之策。

在实践中，这样的“市场意识扶贫”却可能遭遇贫困户的不理解、不合作，但不能简单归咎为贫困户的“等靠要”。发展产业扶贫，需要许多条件，某些条件不具备时，贫困户可能不配合甚至拒

绝参加项目。例如，不敢把菜卖到广州，是因为不懂得物流和批发流程。

对此，天河区的帮扶干部没有简单指责贫困户安于现状，而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找出原因对症下药，才有那些“多此一举”。

做深做实东西部扶贫协作，绝不只是给贫困地区引入产业项目就了事，更重要的是让来自东部地区的市场理念在西部贫困地区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脱贫攻坚战进入“最吃劲”的决胜关键阶段，类似广州天河区对口帮扶的“多此一举”，下的正是“脱真贫”“真脱贫”绣花功夫，体现的正是帮扶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责任担当。

精准扶贫，这样的“多此一举”，多多益善。

▲张勇(右)正在查看今年的刺梨生长情况。

本报记者张典标摄



本报记者张典标

“还学不好的话，我这辈子就完了。”

今年6月，贵州省大方县香古镇社区在广州天河区的帮助下组织了第二次珠绣培训，移民搬迁户殷万芳“逼”着自己报了名。“学不好，只能靠政府养了。”

一个月前，社区组织第一次培训的时候，殷万芳没敢去，她担心自己学不会。实际上，她还是忍不住偷偷去瞧了瞧。穿珠引线看着简单，对她却是极难。

殷万芳一只腿是假肢，手指也比正常人少。刚从山上搬到县城这套两室一厅的新房没多久，她就报名参加社区办的厨艺技能培训，学了一个月也没学好。培训的时候，她只能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一会拿铲一会抬锅。

殷万芳灰了心，她甚至想过搬回山上那座“歪着身子”的老屋。殷万芳发现搬下来之后，买个菜都得花钱，老公患病卧床没收入，自己得经常守在床边照看，也因此错过了社区里招聘的保洁员岗位。

尽管社区干部及时给她家办了低保。她和丈夫两个人每个月共700块钱。“细点用”，勉强能掰着指头过日子。那时候，就算买一块钱一斤的青菜，她心里也“塞得不行，总觉得买了就没钱了。”

几年前，为了装假肢，殷万芳找亲戚借了3万块，到现在还没还清。

更让殷万芳觉得“别扭”的是，“低保不是自己挣的，我没出血汗。”她想去看学一门挣钱的技术。

殷万芳学珠绣比别人慢得多，别人穿两三颗的工夫，她只能勉强穿一颗。半个月的培训，殷万芳没回家吃过午饭。练习珠绣的材料和工具不能带回家，她索性早上吃得饱一点，一直在培训现场练习到傍晚结束。

顽强学艺，为了生活不「别扭」

殷万芳在班上提问最多。一些针法细节，她只能反复问、反复拆、再反复绣。“不是一颗珠子就是少一颗珠子，都是不合格的。”殷万芳回忆，因为老是记不住要领，她问得连自己都不好意思了。

珠绣培训项目的负责人杨奎鑫鼓励殷万芳，有问题随时喊他。再后来，杨奎鑫允许殷万芳晚上带回家练习。

殷万芳每天吃了晚饭就“焊”在桌子边，反复拆、反复绣到凌晨两点多，练到抬不起胳膊为止。渐渐熟了，练到晚上十二点就学会了白天教的技巧。再后来练到晚上十点，最后晚上八点就可以了。到现在，殷万芳一个月能绣两幅作品，已经不比别人慢。

今年7月底，殷万芳交了第一幅作品，领了300块的工资。拿到钱的时候，殷万芳暗淡笑容的脸上浮现出孩子般的笑容。

现在的殷万芳老笑，以

至于第一次见到她的人误以为她是天生乐观。其实，从山上搬下来之前，殷万芳压根笑不出来。家里一亩多的薄地全靠她收拾。她只能趴在地里伺弄庄稼，有时候假肢上裹的泥扯下来能“揉成篮球大小”。

殷万芳算了一笔账，“就算我一个月做一幅，那就是300块，一年下来就是3600块。足够买米吃油，再买点小菜，生活就过来了。”



殷万芳

本报记者张典标

在不到半年时间里，一岁多的寇中经历了一场“漂流”，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直到8月底的一个电话，这场“漂流”才算到头。电话那头的媳妇杨锐告诉寇海龙，终于为儿子寇中找到了一家愿意接收他的托儿所。

46岁的寇海龙是广州市天河区财政局财监科的科长。去年年底，寇海龙报名参加天河区帮扶贵州大方县的干部选派。当天晚上，寇海龙向媳妇和73岁的老母亲史翠花“请假”。

“能不能不去？”杨锐一开始面露难色，最后还是支持了寇海龙。

“我身体也不大好，你走了，家里就只剩孤儿寡母了。”母亲的话让寇海龙整夜辗转反侧。

史翠花确实不容易，儿媳妇每天得上班，12岁的孙女刚上初一，孙子寇中才14个月，要不是自己帮忙带着，这个家全乱套了。

毕竟是母亲，第二天早上，史翠花主动对儿子说，“你要心里想去就去吧，我们能把家里照顾好。”

上世纪60年代，史翠花和丈夫从河南洛阳拖拉机厂支援青海乐都锻造厂，一待就是三十年。虽然苦，可后来通过高考从青海走出来的寇海龙一直把父母当成榜样。

寇海龙没两天就去了大方。缺了“顶梁柱”，最开始受影响的是女儿的功课。以前寇海龙能辅导女儿的数理化，到了大方后，再遇到难题，女儿只能拍了照片，发微信给爸爸。

可后来发生的事，渐渐超出了他的预想。

春节之后没多久，广州起了“回南天”，空气湿漉漉的，史翠花腿疾又犯了，打到四月底终于熬不住回了山东老家。

当时大女儿住校，寇中年纪太小，托管所不敢收，称心的保姆一时半会也找不到。杨锐只能把寇中送到陕西汉中的父母家。

没成想，寇中在汉中待了近一个月的时候，姥姥、姥爷骑摩托车摔了，伤了

挂职干部一家三代「漂流」记

不轻，没法儿带小外孙。

今年5月，寇中又被送到山东的奶奶家去。73岁的老太太，哪能照顾得过来半夜哭闹的小娃娃？史翠花做饭的时候总是提心掉胆的，“万一孙子磕了碰了，出了意外可怎么办。”为此，她请来邻居和亲戚得空时过来帮忙照看。

史翠花偶尔也向儿子吐苦水：“有时候，小孩跑来跑去，也没父母扶着，好像没家一样。”妻子也会在电话里抱怨几句：“自己的孩子都管不了，怎么做父母的。”

寇海龙听着扎心。他能理解媳妇和母亲的苦，毕竟自己亏欠她们太多。

寇海龙只能在偶尔回广州时干更多的家务活来表达自己的愧疚。“有人约我吃饭，能不去的我肯定不去，我宁愿在家守着老婆孩子。”

可事实上，寇海龙老“食言”。回广州，他更多时候是“把家当旅馆”，早出晚归，要么忙着和大方的干部、商户一起在花市上吆喝卖土特

产，要么忙着对接参加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广州企业。

8月底，寇中离两岁还差几天，杨锐和史翠花好不容易在广州找了家愿意接收他的托儿所。接到媳妇的电话，寇海龙正在接受记者的采访。他出去了好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松了一口气，可最后又担心起来，“这么小的孩子能适应得了托儿所吗？”



寇海龙

母亲吗？

卢国珍腿脚不好，得拄着拐，走不了几步，更多时间是卧床。黄正荣早上出门前都得熬好粥或煮好馄饨，在锅里温着。卢国珍不会打电话，只能接。黄正荣生怕母亲在家磕了碰了，每隔一两个小时就给母亲打电话，询问她有什么要做的。

黄正荣说她有三个家，一个在帮扶的村里，一个在丈夫工作的乡镇，一个是女儿工作的县城。最忙的时候，黄正荣白天上山，晚上走访贫困户，走访完还得开会商量扶贫的事，经常晚上十点多才回到家。黄正荣也有无助、烦躁和委屈的时候。可一见到母亲，她就成了干练的“女汉子”。

再后来，黄正荣请了一个贫困户来照顾母亲。“是一个60岁的大妈，两个人聊得欢。”

得空的时候，黄正荣常向母亲聊自己的工作 and 村里的变化。渐渐地，母亲脸上笑容多了，对扶贫也懂得了一些了。

去年年底，县电视台来村里拍摄扶贫干部工作状态时，采访了黄正荣，在一旁的母亲自豪地插话，“我是老党员，她来扶贫，我绝不拖她的后腿。”

大方县扶贫办主任朱翔说，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这样一门心思斗贫魔的大方干部有很多，“这一次脱贫攻坚战，对我们来说一生中就这么一次，一定要打赢，这是一种荣誉。”



黄正荣